

出版人序

1945年4月30日，当阿道夫·希特勒在将近3点半时在总理府掩体里举枪自杀时，苏联红军离他只有几百米远——希特勒无论如何不想落进他们的手里。被装进一只笼子，吊在红场上方，遭受一群怒气冲天的暴民的残酷拷打——这是他在生命快结束时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强迫性想像。 [23]

相反，自从德军1941年6月22日袭击苏联之后，斯大林就再也无法摆脱他的希特勒噩梦了——他对这位独裁者的自尽消息表示怀疑。他认为希特勒是逃跑了，向西方盟军申请了秘密避难，强迫他们继续对苏联作战。有关希特勒之死的报道矛盾迭出，发现的所谓希特勒的尸体越多，斯大林就越是不敢相信。他很快就从可靠的渠道获悉，有多名纳粹政权的高级官员逃跑了。斯大林不满于苏联已经取得的调查结果，于1945年底下令内务委员会调查总理府掩体里最后几天发生的事情，最终确认希特勒的去向。

这一化名“神话行动”的任务由人民委员谢尔盖·格鲁格洛夫负责。他组建了一个由高级军官组成的工作小组，所有的线索都汇集到这里。内务委员会的工作人



1949年12月29日，约瑟夫·斯大林收到了内务委员会有关阿道夫·希特勒的生活和自杀调查的总结报告。

员找来全部可支配的有关希特勒及其统治的资料，负责战俘管理的部 [24]

门的军官们在集中营里侦查这位独裁者的同伙,对他们进行再三的审讯。内务委员会的继任部门内务部也继续执行“神话行动”。斯大林多次让部长会议里他的副手、担任内政部长和情报局长多年的贝利亚向他汇报调查的进程。

1949年12月29日,这位独裁者拿到了有关1933年到1945年期间希特勒生活的长达413页的结论性报告,题为《希特勒档案》。阅读完毕后斯大林让人将它放进了他的私人档案室——总书记档案室。该报告至今还保留在俄罗斯总统的私人档案室里,不允许外国使用者接触。

1959年,斯大林的接班人赫鲁晓夫认为插手联邦德国、围绕希特勒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的激烈争论的机会到了。他指示效忠于党的历史学家们将“神话行动”档案里的部分资料对外公开,然后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意识形态委员会复制了一份《希特勒档案》,并于1959年4月20日交给了中央委员会书记列昂尼德·伊利佐夫。但这份资料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希特勒档案》是对二次大战史的一种解释,不符合党的官方宣传。另外,有关纳粹德国的外交、德苏前线的战斗行动和第三帝国的灭亡的无数细节至今都有不同的说法——这一理由足够封锁这些档案。伊利佐夫书记将它锁起来,归入了“普通类案卷”。

1991年,随着党的档案室的公开,外国历史学家有机会一睹苏联共产党的档案了。由于《希特勒档案》被归于普通类案卷,并且令人费解地被放在档案室的弃置图书里,编号462a的这部档案长时间未被发现。直到马蒂亚斯·乌尔为了德国当代历史研究所的一个研究项目计划有系统地查阅普通类案卷时,这本《希特勒档案》才终于得见天日。一位可以接触总统档案的俄罗斯同事检查了复制本和原件,确认了这些档案的真实性——462a档案是1949年内务委员会版本的一字不漏的复制品。



内务委员会工作小组后来的这部手稿依据的主要是两个人的陈述和记录,他们连续数年、日复一日地生活在希特勒身旁:海因茨·林格和奥托·京舍。希特勒也命令他们焚烧他的尸体(和他妻子爱娃的尸体)。林格1935年就参加了元首的护卫小分队,1939年成为元首的贴身仆从,后成为希特勒的管家。京舍于1936年进入护卫小分队,1943年希



《希特勒档案》是由弗约多尔·卡尔波维奇·帕尔帕洛夫中校领导的一个写作集体编撰的。



海因茨·林格(右)和奥托·京舍(左)。两人从1945年5月2日起被苏军俘虏，转交给了内务委员会的情报机构。

特勒将他提升为私人副官。两人都在1945年5月2日至3日的那天夜里被苏军俘虏。

从1946年到1949年，林格和京舍整整四年都不得不讲述希特勒的情况。审讯者们不断询问那位独裁者的生活环境，他同国防军高层领导的关系，详细询问当时元首大本营里发生的事情。由于非常怀疑希特勒自杀的真实性，他们甚至在1946年将林格和京舍运到柏林，要他们在那里准确地再现希特勒一生最后几个小时的过程，指认焚尸的确切地址。返回后内务部的军官们要求他们——和希特勒的其他前工作人员一起——用文字记录他们的回忆。同时加大了对知名囚犯的压力，取消了他的正式俘虏的身份。如果他们拒绝写下他们的“回忆”，检察机关就威胁要将他们当作战争罪犯起诉。

[26]

估计是林格首先表示同意写“回忆录”的。他的单人囚室里满是臭虫。他受尽污辱，多次遭到鞭打。审讯者无情但有耐心，林格后来说，这让他“绝望透顶”。京舍的遭遇相似。不管怎样，1948年春天他答应就德英的和平谈判写一篇文章，文章被立即送呈了斯大林。

专门委员会的军官们后来将这些记录放进了“神话行动”档案，作者们被送交特别法庭。林格和京舍各被判处25年的强迫劳动。1955年他们连同最后一批战俘被从苏联的俘虏营里释放了。林格即前往联邦德国，京舍被送往民主德国，交给了国家安全部。像其他许多被苏联法

庭宣判过的人员一样,1956年他被送进了包岑监狱。

[27] 参与撰写《希特勒档案》的有许多军官,包括男女翻译。委员会负责人费约多尔·卡尔波维奇·帕尔帕洛夫中校定期检查工作进展,编辑文章的最终版本。他无疑是能胜任编辑《希特勒档案》这样的任务的。他学过法学,自1926年起在苏联的驻外情报机构工作。他在这一领域的工作经验是在德国获得的,在那里,他化装成哥斯达黎加商人——在纳粹党和外交部招募了多名情报员。他最大的成果是发展了至今未能证实的女间谍“爱尔莎/尤娜”。这是后来成为外交部长约希姆·里宾特洛甫亲信的一位高级外交官的妻子。

土耳其和荷兰参战不久,帕尔帕洛夫就落在了斯大林的“大清洗”的磨轮下。他的德国报道显然不符合希特勒-斯大林协定的政治前提。德国国防军发动进攻之后,他获得平反,自1941年年底开始,就以苏联战线后方负责国家安全的人民警察第四管理处成员的身份审讯德国战俘。他的最重要的犯人是陆军元帅弗里德利希·保罗斯,经过连续数星期的谈话,他慢慢地、坚定地将保罗斯吸引到了苏联一方,为纽伦堡审判战争主犯担任原告证人。

虽然帕尔帕洛夫的德语知识公认一流,但要将林格和京舍的审讯记录和笔记整理成一部《希特勒档案》显然很难。在译成俄语时帕尔帕洛夫就得胜任两个相反的要求:文章必须显得真实可信,也就是要尽可能精确无误地把林格和京舍的话再现出来,又得照顾委托人——约瑟夫·斯大林的阅读习惯和期望。帕尔帕洛夫在两极之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叙述风格,一种真实和精炼的官方俄语的奇特混和,让人能明显地觉察到那种期望的压力。

[28] 文章的笔法和结构也让人能明白无误地看出材料的出处——审讯和情报,因此,另一方面,无可怀疑的是,内务委员会的作者群有时无法抵制添入戏剧性或特别情绪化场面的诱惑。《希特勒档案》开篇就出现了同一篇实事求是的客观报道的规则的最显著冲突。对1933年的一个关键情节的描写显然是为了满足戏剧性要求,明显地不可靠。这么做仅仅是为了引入希特勒这个角色,突出他的个人卫队——党卫军

“阿道夫·希特勒”旗卫队的中心地位。直到1935年后的内容才有了证人汇报的特征。后来几年的许多事件,尤其是希特勒的一些密谈,林格和京舍的陈述是惟一的出处。它们报告了没有任何记录的军事会议,回忆了其他证人在法庭或回忆录里慎重隐瞒了的情形。他们也准确地记录了这位独裁者身体和精神的衰退,而没有看一眼医疗档案。

《希特勒档案》同类似资料的区别在于它形成时的具有直接生命危险的生存环境。一方面,林格和京舍必须时刻小心,一句错误的或不精确的说法就会被认为是他们不说实话。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是被单独关押的,他们既不能商量怎么讲也不能商量他们的“自卫策略”。审讯者们又想在多年的审讯中找出回忆不准确之处,不停地拿同一件事再三询问林格和京舍。

林格和京舍的报告还被拿去同其他俘虏的供述作比较。考虑到无论是审讯者还是被问者都看不到这些记录,结果给人的印象就更加深刻了。《希特勒档案》里提供的史实和数据都特别精确,情景描述生动,对资料的引用也很准确。通过对一篇京舍的回忆同现已出版的原件进行比较,发现他在供述时用“得到”这个词代替了“发生”,将“接受”写成“必须接受”。林格和京舍对希特勒的格言的回忆也非常精确。与已经出版的希特勒的演讲和文章及其他同时代的报道对比,虽然存在偏差,但没有很不准确的地方。 [29]

林格的强项肯定在于回忆日常事件、情绪和描述希特勒周围关系密切的圈子。斯大林好像特别感兴趣、最好将它当作“希特勒宫廷”里的闲言碎语来看的那一段大部分可能是出自他的手笔。有着前线经历的京舍具有出色的军事专业知识。他回忆的事情陈述得非常客观。他就这样不带丝毫感情地描述了逮捕和处决希特勒“内弟”赫尔曼·费格赖因的经过。而正是他说服了希特勒,必须将费格赖因交给临时军事法庭。

内务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修改供述内容和形式的情形可能只是例外,但他们对术语的影响却很明显。文章透露了作者小心翼翼、从一开始就想胜任斯大林对这种手稿的要求的努力,尽量适应总书记和最高

统帅的风格。假如斯大林不喜欢这篇汇报或者哪怕只是提出了问题,就可能给参与者带来无法预料的后果。不符合斯大林的想像的章节被删除了。因此最后的成文里仅有两处暗示了1939年的希特勒-斯大林协定。工作人员的努力还表现在,相关人员的姓名、他们的职位和其他相关重要解释经常重复(正如斯大林在他的演讲和出版物中所做的一样),以括号或注脚标注出一些——经常是多余的——有关德国和德国政治的说明。这减轻了斯大林的麻烦,却让今天的读者觉得啰嗦,不习惯。

引人注意的是,对纳粹机构官方名称的使用很简略。有些概念被问者肯定使用了,文中常以改头换面的形式出现。因此经常写到希特勒的卫队,从不写元首护卫小分队,很少谈及旗卫队。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从没有以它的正式名称和相应的缩写出现过,而只作为国家社会党出现(同时形容词被小写)。当需要官方术语时,也多是加引号:“第三帝国”,“褐色大厦”,“狼穴”,“希特勒青年团”或“人民冲锋军”。

本书中使用人名时不用名、官阶或贵族称号是为了保持距离。用常用词“宫殿”来指代希特勒的山庄也属于这种情况。虽然就其规模和修建完整的基本设施来说,用这个词来称呼上萨尔茨山上这座别墅并非不恰当,但林格和京舍肯定没有用过这个词。文中用“行法西斯礼”代替常用说法“行德国礼”或“行希特勒礼”,将保安处头目恩斯特·卡尔登勃鲁纳形容为“屠夫”可能也是帕尔帕洛夫的编辑部写进文章中去的。

最后,一种——大多数使用得很笨拙的——修辞手段也引人注目。为了使报告不单调,增强可读性,编辑们有时突然变换时态。叙述大体上使用过去时,但在想特别突出某个情节时,它会突然跳到现在时。同时常在少数几行里变来变去,有时很难看出其中的逻辑性。

编辑插手的顺序和修辞特点很多。但少数例子就足以让出版人的说法可信了,后人对文章进行任何的汇编和修饰都会不可靠地影响历史资料的特点。因此赫尔穆特·埃廷格的翻译尊重原文¹。《希特勒档案》

1 中译本译者注:此处指将俄文档案译成德文。俄文档案原件中的人名均用俄语发音标注德语人名,本书德文版再依据俄文转译回德文。转译过程中会造成部分人名拼法不一致,为保持原书风貌,中译本译者对此未加修订。非特别说明,本书注解均为德文版作者添加。

的可信度不仅在于它所叙述的内容，而且在于它所诞生的方式方法。修辞繁琐既反映了复杂的形成历史也反映了惊心动魄的政治环境，可视为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得到承认。

《希特勒档案》包括两名天天跟希特勒打交道、但同他并没有私人亲近接触的党卫军军官的描述。他们崇拜他，是虔诚的纳粹分子，但跟大多数同时代人一样，他们不明白这位独裁者追求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在他们的回忆录里，他们肯定更鲜明地强调了一些不同的观点，但从来没有否认过他们同希特勒的直接接近。《希特勒档案》是一部举世无双的特殊资料：苏联国内秘密情报机构的一个作者集体依据两位党卫军二级突击队大队长的材料，花4年多的时间撰写了希特勒的传记，直到它适应了委托人的阅读习惯为止。

[32]

前苏联共产党中央档案室里编号462a的档案不仅包含了许多至今不为人知的有关希特勒的政治和战争的详情，它也介绍了希特勒周围不加粉饰的真实画像，而反映了大德意志帝国的这位元首和那个一度相信能同他瓜分欧洲、最后迫使他陷进一场夺去千百万生命的谋杀战争的人的冲突，则是这部资料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地方。

马蒂亚斯·乌尔和亨利克·埃伯里

2005年1月3日于柏林，哈勒

1

1933年夏。太阳照耀着柏林的威廉广场。总理府就坐落在那里。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后,就从这里开始了“第三帝国”的新时代。[35] 二楼一扇窗户的窗帘后面站着一个人,他中等身材,一缕头发垂覆在额上。他就是希特勒。他身体略微前倾,正观看楼下“仪仗院”里的军事仪式。那里正在换岗,他的卫队,又名党卫军“阿道夫·希特勒”旗卫队的士兵们正在举行隆重的仪式²。党卫队员们将腿高高抬起,靴子响亮地落在沥青地面上。他们身体笔挺,目不斜视。换岗仪式结束了,希特勒从窗前走开。已经14点了——希特勒用午餐的时间到了。

今天同他一起用餐的有副官威廉·布吕克纳和尤利乌斯·绍布,旗卫队指挥官泽普·狄特里希和帝国新闻局长奥托·狄特里希。林格在希特勒的餐厅里负责接电话。餐桌上的谈话一直传到他耳朵里。

从副官们的插言不难听出,他们想抓紧时间在自己的位置上捞取私利。希特勒讥讽地认为,他不打算这么快就重新放弃总理的位置。他尖声喊叫道:“有人预言我只能得到权力几个月。但他们会感到惊奇的。我留下了!” [36]

希特勒宣布,要不惜一切手段打击任何的反抗。“我不是俾斯麦那样的首相,他只是皇帝的帝国总理。我有我的政党!我是元首!元首得

2 1933年3月17日组建的武装部队,最初只有120人,主要负责保护希特勒的个人安全,同时执行重要任务。1938年同党卫军摩托化部队的政治后备队合并成一个摩托化步兵集团军,营地 在柏林的里希特菲尔德。进攻波兰后加入武装党卫军,1940年扩建成旅,1941年扩建成师。1943年10月改编为党卫军第一装甲师,犯下无数的战争罪行。1945年3月在巴拉通湖(普拉滕湖)进攻失败后撤回奥地利,1945年5月初在那里向盟军部队投降。

有什么样的特点呢？首先必须人人都讲那个名字。因此我引进‘祝希特勒健康！’这个问候语，它含有我的姓。我真庆幸我不叫‘奥伯胡宾格耳’或‘翁滕基希纳尔’！*要一直让人民能见到元首……所有的相机都对准着我：我的一举一动大众都能看见。元首必须像演员一样吸引住大众——他的服装，他的表情和他的手势——一切都很重要……”

午餐结束了，希特勒情绪高亢地站起身。他双手插在上衣口袋里，独自哼道：“你赠给我的每一天都很美妙，玛丽·露易丝”——这是他喜欢的柏林酒馆里的一首流行曲。

他突然停下来，转向副官们说道：“命运在关键时刻派我来担当绝望的德国人民的救星，我是多么幸福啊！”

那些日子里，盖世太保所在的柏林阿尔布莱希特亲王街上的阿尔布莱希特亲王酒店的地下室里关押着不赞成希特勒“天赋”使命的犯人³。这座盖世太保监狱里关押的都是特别重要的要犯。

[37] 在“授权法”之后，数十万正直的德国人被投进了集中营——送往奥兰宁堡，布痕瓦尔德或达豪⁴。在希姆莱的指示下，作为危房早就被废置了的监狱大楼又重新具有了“保护人民和祖国”的使命。

总理府里的人都知道，希特勒不断地亲手将新犯人送进监狱和集中营⁵。他解释说：“如果我们用法庭审理来浪费我们的时间的话，我们要做的事就太多了。我不能信任法官大人们。逮捕要实用得多……不

* （前苏联编辑人员的说明）：古老的巴伐利亚姓氏，常出现在笑话和轶闻里。

3 国家秘密警察局的总部设在前工艺美术学校（阿尔布莱希特亲王街8号）里，从1934年底开始，阿尔布莱希特亲王酒店（阿尔布莱希特亲王街9号）就成了党卫军领导班子的办公地点。1933年创建的国家秘密警察（盖世太保）直到1945年都一直行使着帝国政治警察的职权，是纳粹对内统治、负责安全的主要非军事组织。它先由赫尔曼·戈林指挥，1934年起由海因希·希姆莱指挥。从1939年开始，盖世太保参与了德占区有组织的恐怖活动。

4 授权法（克服人民和国家困难的法律）于1933年3月24日生效。它使得希特勒政府在四年内可以不通过国会和国家议院而直接颁布修改宪法的法律。这条有限期的法律被多次延期，从而使得实际上实行的紧急状态一直延续到1945年。达豪集中营和奥兰宁堡集中营是1933年3月国会纵火案之后最早修建的两座正式集中营（分别始建于1933年3月20日和21日），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直到1937年7月15日才修建。

5 希特勒很少亲自将人送进集中营。但同时代的证人回忆说，希特勒经常威胁要让人将某人送进集中营。

用那些拘泥条文规定办事的人……我动用这种权力。我是我自己的司法部长！”

阿尔布莱希特亲王酒店的地下室远远容纳不下“第三帝国”所有重要的“政治犯”。他们也挤在柏林滕珀尔霍夫区臭名昭著的哥伦比亚大厦里，一座因是危房而废置不用的工厂大楼，盖世太保也同样将那里布置成了一座监狱⁶。

柏林的这座盖世太保监狱的看守人员都是精挑细选的在希特勒上台前就“专门”暗杀共产党人、在柏林街头用棍棒打散共产党集会的纳粹分子。他们的看守室里贴有标语，写的是：“元首下令，我们服从！” [38]

犯人们受尽折磨，遭到脚踢和非人道虐待。

看守们笑着说：“我们在这里很开心……希姆莱说过：‘将无法改造的人关在监狱里，直到他们变成黑色……我们是在为国家的再生拓平道路。’”



1934年6月23日。党卫军“阿道夫·希特勒”旗卫队营地所在的柏林里希特菲尔德军营的大门接到特殊命令关闭了，任何人都不许离开军营。命令睡觉时要全副武装，棍棒和头盔放在小板凳上，冲锋枪摆在桌上。连续一星期，每天夜里都发出演习警报。没人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上司们严守秘密。

6月29日晚，旗卫队的多支队伍终于在里希特菲尔德东站被装进车厢，运往慕尼黑。上车时就有传闻，希特勒最亲密的战友之一、冲锋队(SA)总指挥恩斯特·罗姆正在策划一场叛乱。据说，在冲锋队的支持下，罗姆为他在希特勒上台时的贡献要求希特勒给他在国家政府里安排一个更高的职位。

6月30日下午，这些旗卫队的队伍在慕尼黑的总站下了火车，坐车

6 19世纪修建的位于哥伦比亚大道和高尔瑟纳路拐角的军事拘留所，后作监狱，然后又用作工厂，自1933年起被用作集中营。以迫害中心而臭名昭著的哥伦比亚大厦于1936年被关闭，1938年被拆除。在保安队和党卫军使用它的三年里，这里关押了大约8000人。

前往“褐色之家”^{*}。希特勒站在“褐色之家”的阳台上。党卫队员们排成
[39] 四排,正步从他身前走过。

此时,所谓的“罗姆叛乱”已经以罗姆及其支持者的被捕被扑灭了。这次行动是希特勒亲自领导的。6月30日凌晨,他在严密保护下率领车队前往巴特维塞(距慕尼黑两小时车程),罗姆和他的参谋部就设在那里。

在巴特维塞,希特勒逮住了正同年轻的同性恋者在床上鬼混的罗姆、西里西亚冲锋队大队长海因斯及冲锋队其他高级将领。他下命将

他们全部逮捕。罗姆被关进慕尼黑的警察监狱。在那里,他被要求自尽,还在他的狱室里放了一把手枪。罗姆哭泣着扑倒在地,恳求饶他一命。德意志人民所认识的这位国家社会党和“第三帝国”的领袖的骄傲姿态和空洞言词只剩下可怜的呜咽⁷。

罗姆被枪决了。

官方声称罗姆是因为同性恋行为被处决的。但希特勒向德国人民隐瞒了这一事实:同性恋在国家社会党的领导圈子和希特勒青年团里非常普遍,是得到容忍的。

希特勒用下列话语向他的亲信们道出了他让人枪杀罗姆的真正原因:“我不许别人再同我开玩笑!我这样做是要警告所有隐藏的和公开的敌人!我不是老派的总理。我是希特勒!党和国家只有一个统治者,那就是我!”

^{*} (前苏联编辑人员的说明):民间将“褐色之家”叫做慕尼黑黑宫殿,这里是纳粹党领导班子的办公地点。

⁷ 罗姆没有呜咽。这位冲锋队首脑拒绝自尽,被两名党卫队军官枪杀了。他最后的话是:“我的元首,我的元首!”

“罗姆叛乱”是希特勒和罗姆之间的权力斗争,在那些日子里,许多因种种原因让“第三帝国”感觉不爽的无辜者遭到了枪杀⁸。

[40]

留守在里希特菲尔德、参与柏林枪杀事件的旗卫队的党卫队员们向从慕尼黑返回的战友们报告了详细情况。犯人们被一卡车一卡车地装运到里希特菲尔德的营区内,赤裸上身,排列在军营大院里小教堂的墙前,在那里被枪杀了⁹。

枪杀小分队的成员们报告说:“你们想像不出我们醉得有多厉害。他们不停地给我们酒喝,让我们喝醉。”

在那些日子里,前国家总理和国防部长冯·施莱彻尔将军也被“摆平”了。国防军里人人都知道,作为希特勒的对手,施莱彻尔赞成军事独裁。



在希姆莱的指示下,两名盖世太保成员闯进将军在柏林的住宅。为他们开门的施莱彻尔的女儿被当场打死。盖世太保成员从她的尸体上跨过,当施莱彻尔伸手抓他的手枪时,他们开枪打死了他和他的妻子¹⁰。

直到1934年被害,一直是海因里希·希姆莱的上司:恩斯特·罗姆,冲锋队参谋长。

8 被遮人耳目地称作“罗姆叛乱”的谋杀行动中至少有85名冲锋队高级将领和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著名对手被枪杀了。在6月30日至7月2日期间,总共有数百人,有可能多达千人丧生了。1934年7月3日颁布的“国家紧急自卫法”事后宣布这次谋杀行动为合法。

9 在里希特菲尔德,“阿道夫·希特勒”旗卫队的党卫队员们总共枪杀了14人,包括柏林和勃兰登堡的冲锋队负责人及其副官。

10 为盖世太保的官员们开门的不是施莱彻尔的女儿,而是他的一位女管家。她逃脱了对冯·施莱彻尔将军和他妻子的谋杀幸存了下来。根据她的证词,将军也没有伸手抓手枪,而只是在盖世太保的官员们问他是不是冯·施莱彻尔将军时回答了一声“对”,对方听到回答就开火了。将军之所以被除掉,是因为1932年他曾同右翼力量一起试图分裂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将希特勒挡在政府领导层之外。

2

希特勒虽然清除掉了党内的对手和竞争者,但他还是不能独自统治。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这位年老体迈的国家总统,仍然挡着他的路。对于野心勃勃的希特勒来说,生活在这样一个人物的阴影下,实在是无法忍受。 [41]

1934年9月9日,兴登堡终于死去了¹¹。在他死后,希特勒自命为国家首脑和国防军总司令。希特勒同样也将国家总统的位置据为己有。这下他就一手控制所有的权力了。

在兴登堡去世后举行的首次国会演讲中,希特勒宣布,他放弃他作为帝国总统应得的薪水¹²。这一声明就像戈培尔的宣传故事一样,同样是蛊惑德国人民的诡计,希特勒这样做是要显示他是个想为人民服务的大公无私的人。

随着纳粹的上台,希特勒成了德国最富有的人之一。他的收入高达数百万马克,当然不需要总统的薪水。他的《我的奋斗》一书是必读图书,给他带来了丰厚的利润¹³。

11 国家总统保罗·冯·兴登堡陆军元帅早在1934年8月2日就在他的诺伊德克庄园去世了。国防部长布洛姆贝格随后让国防军宣誓效忠“德意志帝国和人民的领袖阿道夫·希特勒”。

12 希特勒早在1933年2月就放弃了高达47200马克的总理薪水。1935年3月12日起,他不再纳税了,但是,除了总理薪水,他还让人将帝国总统的薪水汇给自己。

13 《我的奋斗》一书在1930年销售了54000册,1931年50808册,1932年90351册,1933年854127册。希特勒向财政部申报的1933年的收入为1232335马克,他声称其中的一半被用于职业支出了。接下来的几年里埃尔出版社支付给《我的奋斗》的版税为100万到200万马克,但希特勒未让全部支付。1944年他在出版社的财产为5525811马克。《我的奋斗》主要是纳粹党徒的必读图书,新婚夫妇举行婚礼时也经常会得到赠送。



希特勒是纳粹党内出版社埃尔出版社的合伙人。它吞并了一家又一家出版社,最终成为了德国最大的出版集团¹⁴。由于它的垄断地位,它赢利丰厚。其中很大一部分由希特勒所得¹⁵。希特勒也支配纳粹党的财政,而不受任何监督¹⁶。

原则上讲这是一个巨大的资本主义企业。除了党费,德国企业家和银行家的大笔捐赠,各企业的收入,包括梅克伦堡和巴伐利亚的田



1933年5月1日冯·兴登堡总统同希特勒一起去参加集会。

庄的收入,都统统流进了党的财政。

为了获取利润,甚至纳粹党创办了一个分布在全德国的酒店集团。它叫做“法本国家社会党酒店集团”。总裁是马丁·鲍曼的朋友

阿尔特那齐·法本。

但这样高的收入还是不能让希特勒满足。他上台后违背相关规定,下令“国家基金”和“应酬基金”不受总会计署的监督¹⁷,这样他就可以不受妨碍地为了私人目的挥霍金钱。同时他声称:“我不允许这些老朽来规定我可以支出多少!”

14 1944年,纳粹党自己的党卫军股份有限公司和赫洛德出版公司,埃尔出版社/纳粹党的中央出版社就属于这家出版公司,加上它们的子公司,拥有德国全部报刊的90%和大部分图书市场。希特勒用捐款收购了《人民观察家报》,先是作为所有人注册的。20年代中期开始,由他的亲信马克斯·阿曼控制国家社会党的这家中央出版社。

15 希特勒主要将这笔钱用于资助党的机构和政治工作。这里暗示的中饱私囊不是国家社会党经济活动的目的,不过,大型建筑工程——如山庄和总理府——是用国家资金支付的。

16 1933年将国家社会党定为公共法律的象征,保证了国家社会党动用国家资金。因此希特勒不仅不受限制地拥有党的财政,还拥有全部的国家资源。

17 指“供总理的一般用处支配”和总统的“一般许可”的预算条目。自1935年起总审计署就不再进行检查了。希特勒主要将这笔钱赠予“有功的”官员或军人,有时也用来拉拢主宰国家的精英们。

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上萨尔茨山购买了大块地皮,让人在那里修建了一座豪华宫殿,它以“山庄”之名闻名。为了修建这座宫殿,上萨尔茨山上进行了大规模的拆迁。住房,公寓房,就连被从德国送进那里进行空气治疗的一座瘫痪儿童疗养院也被夷为了平地¹⁸。

希特勒的宫殿建有漂亮的花园和道路,约花费了一亿马克¹⁹。修建它不仅浪费了人民的钱财,而且牺牲了人命。宫殿修建在几乎无法到达的很高的悬崖上。爆破时没有足够的保护措施,引起了山崩和落石。工作条件像囚犯一样,发生过死亡事故²⁰。

山庄宫殿修在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区,位于空气疗养地贝希特斯加登附近上萨尔茨山的海拔1000米高的山坡上。它有60个房间,房间里布置有贵重的家具,名贵的织花壁毯及荷兰、意大利和德国大师的绘画。

这些绘画是希特勒从慕尼黑古董商阿尔默斯夫人、柏林古董商哈贝尔施托克及通过他的摄影师霍夫曼和德累斯顿画廊的经理购买的²¹。

[44]

希特勒的餐厅位于底层。整个餐厅镶嵌着浅色松木护墙板。饰品有银餐具,贵重的瓷器 and 水晶,价值数百万。餐具来自国家藏品,希特勒上台前它们用于柏林的政府招待会。银餐具上除了德国鹰和卐字之外,还刻有缩写字母“A.H.”(阿道夫·希特勒)。桌上摆放着天使造型的金色灯架,天使手举烛台。

18 1933年到1937年间,国家社会党在上萨尔茨山购买了54块地皮,面积近290万平方米,希特勒自己购得8万平方米,巴伐利亚森林管理处让出了克尔斯坦因地区约670万平方米。扩建过程中拆除了50座房屋。一开始还慷慨地向前主人支付赔偿金,后来则不断增加压力,逼迫他们卖房。国家社会党的全权代表们拿“送进集中营”威胁那些房主。

19 无法查明整个地区的建筑费用有多高。

20 扩建上萨尔茨山时,动用的工人多达6000名。先是德国人,战争开始后主要是捷克和意大利的专业工人,从来没有使用过强制劳动者。他们被安置在简单的棚屋里,劳动纪律非常严厉。触犯纪律后有不同级别的惩罚:罚钱,扣除食品配额卡和烟配额卡,监禁。在上萨尔茨同和克尔斯坦因地区的修建工作时,总共有14名工人意外丧生。

21 德累斯顿国家画廊的负责人、博士海因茨·波瑟教授自1939年起担任“林茨特殊任务”负责人,负责为希特勒的别墅和他计划修建的林茨博物馆选购绘画。为此,这个特殊班子掠夺被占国家的博物馆,通过中介人以远低于其实际价值的价格从犹太人的财产中收购画作和雕刻作品。